

Sovereignty is NOTHING.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430)

The immense realized void is this infinite improbability and across it I, as imperative existence, play, because a simple presence suspended above such an immensity is comparable to the exercise of a dominion, as if the void in whose midst I am demands that I be *me* and the dread of this *me*. The immediate exigency of nothingness would thus imply not undifferentiated being but the painful improbability of the unique *me*.

The empirical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this *me* has in common with the other *mes* has become an absurdity in this void where my dominion manifests itself, for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me* that I am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no other conceivable existence can replace it; the total improbability of my coming into the world poses, in an imperative mode, a total heterogeneity. (“Sacrifices” *Visions of Excess* 130)

“to account for the psyche in terms of spacing, a topography of traces, a map of breaches; and we repeatedly find an attempt to locate consciousness or quality in a space whose structure and possibility must be rethought, along with an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pparatus’ in terms of pure differences and locations, an attempt to explain how quantity of excitation is expressed in ψ by complexity and quality by topography.” “Trace will become gramme; and the region of breaching a ciphered spacing.”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05)

“We ought thus to examine closely—which we cannot do here—all that Freud invites to think concerning writing as “breaching” in the psychological repetition of this previously neurological notion: opening up of its own space, effraction, breaking of a path against resistances, rupture and irruption becoming a route (rupta, via rupta), violent inscription of a form, tracing of a difference in a nature or a matter which are conceivable as such only in their opposition to writing.”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14)

“We have already defined elsewhere the fundamental property of writing, in a difficult sense of the word, as spacing: disatem and time becoming space; an unfolding as well, on an original site, of meanings which irreversible, linear consecution, moving from present point to present point, could only tend to repres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could only fail to repress.”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16)

“The trace is the erasure of selfhood, of one’s own presence, and is constituted by the threat or anguish of its irremediabl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its disappearance.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30)

1. 律法的疆界與暴力

我們仍舊要持續對於佛洛伊德所提出的文明與律法的象徵暴力進行思考。

律法(nomos)的字根—*nehmen* and *Nahme*—含有土地佔有、墾殖經營、建立秩序以及劃分界限等面向。¹ 界限之內屬於可以有效控制秩序的整體系統，界限之外則是不屬於此整體的異質物。社會的律法有其鞏固自身的傾向。當身體的邊界成為社會邊界的象徵圖式時，對於污穢物或是不潔物的控制或是排除，時常便是建立社會穩定狀態的儀式。不過，身體的任何空隙都有其內外出入的過程，社會亦然。正如瑪麗 - 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一書中所說，污穢與異質物是再生與創造的來源。一個系統的更新，就需要有異質物的滲透，使得這個系統得以鬆動。² 因此，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便是：甚麼時候這個律法成為具防衛性的封閉系統，為了維持體系的穩定運作，而禁止接觸任何異質物？甚麼時候這個律法是維繫社會運作並且可以隨時調整容許變化的狀態？這個律法如何被內置於人們的內心呢？在這些問題的背後，我們關注的根本問題還是時代話語結構與主體之間曖昧而緊張的關係。我們要透過歷史化的工作，思考當一個人的存在意義如何早已置入於時代話語邏輯之下，受到其制約或是誘惑而自行出現的主體，如何已經犧牲了自己的多樣本質，甚至以被合理化的自居身分，對於不屬於同一體系的他者無意識地壓迫？話語結構的歷史性是不容被忽視的，對於話語結構進行歷史性分析，目的就在於揭露此結構的限制，對於其不被置疑的價值體系進行解構，而讓此結構之下的層級化與疆界區分可以被鬆動，而讓每一個人可以有其自由發展的空間。

我們可以藉由巴岱伊(Georges Bataille)關於歷史同質化工程以及其吸納與排除的過程，以及關於「知」與「主權」的反省，進行思考。巴岱伊以「主體」即是「主權」以及「主權」即是「無」的論點，提出了他的基本論點：片面主觀位置的吸納與排除的運作邏輯已經是奴役狀態，從屬於某個功利主義概念或是價值體系，而真正主權則是變動中的片刻環節(moments)，在每一個知識體系的極限處脫離其侷限。巴岱伊的論點背後，我們看到了從黑格爾、施蒂納、尼采到海德格關於「無」的否定性概念，以對抗觀念的固定僵化體系。「無」並不是湛然寂靜的「空無」，「無」不能夠是一個等待被填滿的最高空位，而是生命的動態力量本身。巴岱伊為了「主權」即是「無」的論點，他首先建立了「知識」的同質性內部循環的架構。我們先從他關於同質性系統的吸納與排除的歷史過程先進行討論。

2. 吸納與排除：巴岱伊對於知與非知的論點

¹ 可以參考施密特在《歐洲公法與大地法》一書的討論。Carl Schmitt's social-economic as well as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word *Nomos* and its inherent links with *nehmen* and *Nahme* have already pinpointed the "brutal imperialism" and "atavistic criminality" of land taking and land holding procedures of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Schmitt reminds us: "It is not safe, even today, only to remember that *nehmen* and *Nahme* comprise a substantive problem, and not to mention that they also mean brutal imperialism, atavistic criminality, and a sadistic opposition to progress." Carl Sc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346.

²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1966)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社會的觀念是個強而有力的意象。此意象有形狀，有外在界線、邊緣、內在結構。其輪廓具有酬勞服從而驅逐攻擊的力量。在其邊緣處以及無結構的區域有能量。就社會的象徵而言，任何人類結構性的經驗，邊界都是立即存在的。」(115) 「儀式作為強化社會關係，賦予可見之表達形式的操作。」(129) 「當毀壞、腐化、分解的漫長過程結束，所有身份不再存在，原有的成分完全消失，則此廢物便不再具有危險性。因為它們不再具有曖昧不明的狀態。。。污穢本身也是再生力量的來源。」(161-162)

我們要如何理解巴岱伊所說的主權或是相對於主權的奴役狀態？

巴岱伊指出完全的主權 (sovereignty) 是非從屬、非奴役性，也非功利的狀態。巴岱伊認為，以觀念結構所限定的主權概念，例如國家主權，是服從於特定功利目的與知識結構的奴役狀態。對巴岱伊而言，主權狀態是思想脫離任何知識的奴役關係，是「非 - 知」(un-knowing)，是「無」(NOTHING)。這個「無」的主權如同黑格爾式辯證運動中的一個環節，是思想在運動中再次啟動的時刻(moment)，是「在所有擁有主權時刻的人之間的溝通」。³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370) 巴岱伊的說法，預設了人在知識結構中的片面性與局限性，以及此知識結構的歷史條件。若要不被既定的知識結構所奴役，首先便須要理解此結構的極限與盲點。鬆脫於知識結構的囚禁，在知識不可思的極限處，無論是文學性、藝術性或是思想性的工作，我可以任意選用「偶然之物」(aleatory object)，「物」同時是我的熱情(passion)，也是我的勞動(labor)。我透過「物」將自己客體化，我的話語滲透於其中，而我的無限性也透過「物」而投射出來。(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376-379) 脫離功利目的而擁有「主權時刻」(sovereign moment)的語言，不同於我們日常熟悉的溝通式語言。配合日常熟悉語言的模式，則受制與奴役於當時的價值體系；主權思想超越知識界限，摧毀人類可共量的語言，而揭露了一個不同的空間。(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380-381)

巴岱伊所以要強調知識的片面性、主觀性與局限性，原因是人類知識總是在同一律的基礎以及吸納 - 排除(appropriation, excretion)的邏輯上建立的。巴岱伊利用社會事實來說明所謂吸納與排除的系統。他將社會事實區分為宗教事實(禁忌、責任、神聖)與世俗事實(公民社會、政治、司法、工業與商業組織)，簡單的吸納過程通常伴隨著綜合的複雜排除過程。巴岱伊所謂的「吸納」，涉及了參與、認同、合併、同化(participation, identification, incorporation, assimilation)等活動，基本形式是口腔式的，例如聖餐禮，而其背後則是佛洛伊德所討論的認同機制。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家具、居所、生產工具、土地，也是人類進行納入活動之對象，其中牽涉了人與其對象是否擁有同質性，或是同一性。因此，社會基於人群共處而發展出來的符號法則，無論是風俗習慣或是服飾建築，必然具有其同質性。然而，巴岱伊認為，吸納與排除的過程是同時發生的。城市中居民的同質性，是透過一系列標誌異同的概念而區分出同質與異質的層級，此概念的發展則繼續擴展為符號系統的差異("The Use Value of D.A.F. de Sade," *Visions of Excess* 95-96)。命名與歸類的同時，便進行了排除，也生產了廢棄物。同質化的過程必然會造成異質物的運作，哲學、科學、常識等思想工作，延續著建立同質社會的工作，以及其必然發展的過剩廢棄物之生產。

巴岱伊指出，科學知識是無法探知異質物的，因為科學知識僅在同質系統中運作。異質物總是以廢棄物或是被引為羞恥之物的方式出現。這些異質物無法被放置於客觀的範疇，科學之客觀性是在知性的類同吸納下建立的。如果類同關係無法被建立，便會被視為是虛假不真實而非客觀存在的現象。這顯示

³ "It is reencountered in an equality – in the communication – with all the sovereign moments of all men, insofar as the latter do not want to take them for thing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370)

出了人類的強力意志所堅持的，是一個柔弱而同質順服的社會。理性之區分下的二元對立，吸納與排拒，使得理性思維必然在其系統之下尋找對立，以「知性的糞便學」來將無法同化的異質物排除出去。（“The Use Value of D.A.F. de Sade,” *Visions of Excess*, 98–9）巴岱伊要進行的思考工作，便是分析在知識系統之下被辨識為「異質」的物質，以便反向檢視此知識系統的局限。

巴岱伊的核心論點在於強調事物的延續狀態，而不是二元對立。他將腐爛衰敗視為事物存在狀態的延續。若無法接受腐爛衰敗，而將此狀態視為生命的反面，則正是「非人」的觀點，而是知性的觀點，而且此知性觀點隸屬於一系列的知性吸納系統。（“The Use Value of D.A.F. de Sade,” *Visions of Excess*, 99）巴岱伊強調物質本身不區分善惡，不分形神，任何以抽象概念、理性與意志所展開的價值秩序如果脫離物質本身，便會成為唯心的結構，如同無限擴大的吸納系統，自成一套權力系統，並且將負面物質劃分為必須排除的異質物。自然界的生命豐饒而多產，生滅隨時發生，並不會在任何一刻停頓。人類世界卻充滿了禁制，這些禁制是其他個人或是群體所設的禁制。人類的施虐、擴張、佔有、累積、建立同質性體系、消滅對手等等隱藏的慾望與暴力，則是人類無法自知也無法看到的。（“Laws of General Economy” *The Bataille Reader* 195）神聖事物所構成的現實，不是科學/知識所能夠客觀的觀察、辨識的現實，因為基本上這是異質性的現實，是「我」所無法明確劃分與表達的部分。如果要以自己的知識結構來強行將此異質性現實視為研究對象，進行分類與命名，則是將其放置於在可約分與計量的層次，簡化為同質性的物質，而施展了知識的暴力。

在具有歷史性的知識結構之下，「我」因此而形成。我所堅持的「我是我」，具有其內在的暴力。巴岱伊說，「我」已經是知識的對象。「我」以一種焦慮的方式操控了原本是空無的存在。可是，實際上，人之構成是以無數分裂的微粒子組成的，社會亦然。當絕對命令式的「抽象我」(abstract me) 採取主宰位置，或是社會中的抽象觀念佔據了主宰地位，那麼這些異質成分的「我」或社會中的份子(part)便會被拋離驅逐。這種投射的基礎，便是建立於尋求與無條件而絕對存在的神聖結合為共同體的欲望。然而，政治權威的原則往往使得此愛的結合被丟回到實用生活的功利層次，並且導向具有道德訓令的壓抑狀態（“Sacrifices,” *Vision of Excess*, 130-133）。弔詭的是，正因為「我」之根本空無與分裂的狀態，因此當任何「主體」要以絕對命令式的整體狀態主控情勢時，便會攜帶著具有威脅力的壯麗，以更為暴力的方式投射於此黑暗虛無之中。（“Labyrinth,” 176）

這種朝向神聖的投射與犧牲，失去自身，是具有絕對吸引力的。巴岱伊說，犧牲便是透過「失去」而捕捉「神聖」。犧牲的意義在於贈與，將完整的自我贈與神/君主，以便透過離開此俗世，參與神/君主的世界。⁴ 消耗(expenditure)與失去(loss)的快感邏輯，是個十分複雜的概念。在〈消耗的概念〉(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一文中，巴岱伊強調，傳統的功利原則無法充分解釋人類行為，因為所謂的生產、有用、保存的目的，無法完全說明人類的

⁴若將主體對於統治者的臣服與犧牲放在這個脈絡，其中甚至摻雜了宗教性的狂喜，我們便可以理解不同脈絡下的領袖崇拜之心態，例如第三帝國納粹心理結構、天皇制的皇民主體或是毛的追隨者。

活動。有更多的人類行為是為了追求非功能性的「失去」而完成。此處，我們看到巴岱伊回應佛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的詮釋路徑。巴岱伊舉出的例子包括哀悼、奢侈、戰爭、儀式、奇觀、藝術、賭博、變態性活動等，這些不同型態的「失去」，屬於「消耗」的範疇。「消耗」不同於「消費」(consumption)。消費是滿足需求，而消耗則是浪擲，是主動的「失去」。巴岱伊指出，賭博活動中，真正吸引人的，就是「失去」的強烈吸引力。此種失去，與死亡的危險相近。藝術所呈現的，其實也是各種狀態的「失去」。詩、戲劇、文學、舞蹈、音樂，在某個層次而言，都引發了情感的失去狀態。

巴岱伊的「消耗」與「失去」的概念背後，有牟斯(Marcel Mauss)所討論的原始部落誇富宴(potlatch)的非功能性與非生產性的禮物贈與、揮霍與消耗。(“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Vision of Excess*, 116-129)。巴岱伊所討論的「消耗」，是一種「象徵消費」(symbolic expenditure)，都是浪擲與「失去」，而都牽涉了失去自身的快感，以及犧牲與拋擲自己，以便達到神聖合一。

3. 實用異質學

犧牲牽涉了巴岱伊理論中相當根本的問題，也牽涉了他的「實用異質學」的論點。說明了人們為何想要進入共同體，求取結合，以便進入權力，進而朝向瘋狂發展。巴岱伊說，歷史的目的其實是朝向無階級的社會(classless society)，然而人類社會卻始終同意特權階級之存在。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或是共產主義社會，都有其價值體系之下以某種主觀位置建立層級地位、累積財富、擴張勢力，甚至進行鬥爭與殊死戰。這些古老的國家主權形式以主僕從屬關係建立層級；然而，在巴岱伊概念中的「主權時刻」，卻是沒有任何價值層級或是社會階級地位的。主權思想或是主權藝術，如同尼采的語言，脫離了主觀立場，脫離了被奴役而綁束的主體位置，而可以透過書寫無限浪擲超額的享樂。(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428-429)

巴岱伊強調，他的「主權時刻」與黑格爾辯證邏輯的運動環節是一致的。他說，按照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來說，自然本來就是以持續運動之辯證模式進行，以否定與反叛(negation, revolt)，離開觀念(idea)，而不可能有任何「基礎」(foundation)。巴岱伊所指出的問題，正在於辯證運動之「基礎」。他批評恩格斯所建立的基礎在於現實的階級，然而黑格爾的基礎卻是運動本身，是「無」的基礎。以現實的階級作為矛盾辯證起點，甚至以線性發展作為歷史進程的馬克思唯物辯證主義，其實正是抽象概念作用的唯心主義。⁵巴岱伊指出，唯一可以脫離系統化與抽象化唯心主義的出路，只有「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甚至是他自己所提出的基底物質主義(base

⁵巴岱伊指出，恩格斯放棄自然辯證法，而採取以現實基礎作為辯證邏輯的出發點，而其所謂的現實則是階級，因此階級矛盾與主奴鬥爭便必須持續進行。巴岱伊認為這個以階級對立作為矛盾辯證的軸心，使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成為了一種宗教，以否定批判來摧毀對方，而離開了辯證運動。恩格斯也借用了數學的概念，但是他所說的發展進程之完滿狀態，卻正好是數學家所致力修正的錯誤概念。數學中的直線或是曲線，都只是語言的暗喻，其實都是「點」或是「集合」的問題。沒有任何線性發展的數列。每一個數都有另一個數，或者，每一個「點」都是一個包含無限的「集合」。按照此數論，則不可能有二元對立的矛盾。巴岱伊強調，若要討論個別案例(particular cases)，則不能以觀念性的構想討論社會從幼年、青年、壯年到老年的線性發展進程。(Bataille, “The critique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105-114)

materialism)，也就是說，不將物質視為形質(form and matter)二元的對立，而將物質視為如同黑暗的創造力。物質，material，字根源自於拉丁文的 material (wood, material, substance)以及 mater (mother)。物質的不斷醞發，便是自然(physis)本身。形質區分只是語言之效果。古希臘(Hellenistic)的一神論其實是光明與黑暗二元對立的一元論，而將黑暗與惡視為良善的墮落。巴岱伊所提出的基底物質主義則以Gnostic 或是Zoroastrian的方式，不區分光明黑暗，而強調物質持續處於變化的運動之中，不服從於權威或是觀念，具有自身的創造力。(“Base Materialism and Gnosticism” 45-52)

然而，要如何針對特定社會中的優勢價值以及這個被詛咒的持份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呢？巴岱伊指出，知性過程自動將自身限制於一致的範疇，科學知識只能夠獲得同質性的元素。以被給定的知識體系，我們無法進行任何批判性思考。我們時常受到意識的欺瞞，而將最深的慾望藏在無意識的範疇。我們將自己限制於知識的結構以及理性的操作，以便減少無法預計的風險。但是，這套知識卻可能早已建構於一套服從體系，正好使我們無法看見全然的狀態。我們以理性所認知的世界是完整而一致的，但是這個體系卻使得「此時此刻」成為無效，如同「零」而無法計算。這個空無的核心，是使知識中斷之處，而將此空無填入有用之工作，便是人的衝動。⁶ 在此知識結構之下，我們無法檢視知識邏輯的至高點，而必須經過其他途徑。不同型態之至高狀態的洩出，突然的開口，例如笑、淚水、詩歌、悲劇、喜劇、憤怒、狂喜、著迷、舞蹈、音樂，都是讓我們在突然中看到知識結構之外的面向。(“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of Sovereignty,” *The Accursed Share II* 225-230)

藉由歷史經驗，巴岱伊的研究反覆討論這個驅使我們不自知地朝向災難的隱藏法則，特別是從語言中重新掌握此被當作對象的「物」所展現的慾望或是暴力。巴岱伊說，除非我們認清工作與情慾、情慾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不然我們無法探究政治問題底層所隱藏的問題。在這些不同形式的人類活動之下，有相同的動力來源。(“Preface,” *The Accursed Share II*, 15-17) 巴岱伊顯然注意到，任何當下的歷史判斷都是完全侷限在鬥爭對抗的觀點中。因此，巴岱伊認為我們要從任何戰鬥的理由中抽離(“distancing ourselves from every reason for fighting”)，因為對立鬥爭中，我們永遠只看得到單一的真理與邏輯，而看不到真理的全貌。「在政治鬥爭中的人永遠不法理解情慾的真理。在他們的戰鬥中，情慾活動永遠會發生，而人們則對他們所釋放的殘酷性之動機完全盲目。」⁷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II, “Epilogue,” 191) 要避免受到片面主觀的抽象概念所奴役，就要透過巴岱伊所說的「斷念」(détente)、「延遲」與「非知」，「延遲」(distention, defer) 的觀念：「除了延遲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希望，延遲是一種從外而來使我們聆聽的智慧」。(Bataille, *The*

⁶ “In it, the moment is expressly nullified; the momen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kind of zero with which we no longer se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unt. It is the point, and the core, where the movement of knowledge, which always has elements distinguishable in duration as its object, runs aground and breaks apar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of Sovereignty,” *The Accursed Share II* 227)

⁷ “Erotic activity always takes place at the expense of the forces committed to their combat. But what is one to think of men so blinded as to be ignorant of the motives for the cruelty they unleash?”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II, “Epilogue,” 191)

Accursed Share, II, “Epilogue,” 191)⁸ 此處所謂的「從外而來」，以及「延遲」的概念，與海德格所說的ek-static, 十分接近。巴岱伊說，這種延遲是一種挑戰，一種狡猾，一種諷刺，一種沒有幻覺的平靜，以便對抗暴力的語言或是預言式的激動。(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II, “Epilogue,” 191) 「從外而來」以及「延遲」，是脫離現有知識體系框架之侷限以及立即行動的迫切，而讓擁有主權之思想得以出現。巴岱伊強調，知識只會引導我們操作同質性而重複的「知」。要處於全然主權的位置，則必須在所有知識之外或是之上。巴岱伊甚至強調此主權時刻的「軟弱」與「無力」(weakness, powerlessness)。(“Knowledge of Sovereignty,” *The Accursed Share II* 202) 巴岱伊清楚地指出，服膺於事物客觀功能性的主觀者，其實已經從屬於單一體系的目的論與功能論，此種主體是不自由的。使客體脫離主觀性的觀念束縛，重獲自由，而主體也從而獲得其自身的自由。(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428)。

4. 德希達論書寫場景的原初歧異

如何岔出文明的律法？如何讓生命的存有不被囚禁，而能夠不斷展開？德希達透過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原初便具有悖反性質的生命動力，說明了生命本身便是心靈能量透過間隔之空間化(spacing)所出現的延異之印跡(traces)。德希達所關注的環節，便是佛洛伊德在說明「關路」⁹時所展開的概念：神經元接收經驗訊息並且產生興奮，由於阻抗與壓抑而轉移投注，並且留下痕跡，所謂的「記憶痕跡」。¹⁰這是第一次的再現，也是原初壓抑。就佛洛伊德而言，原初壓抑是記憶得以發生的起點；德希達則繼續說明，對於佛洛伊德而言，壓抑不是遺忘，不是排除，不是逃逸，不是驅逐外力，而是內部的再現，是再現的空間化。(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196) 這個具有創造性的壓抑，便是任何心靈銘刻的起點，原初就已經是延異的過程，是打開一個空間，岔出一條路徑。透過阻抗而產生的一個印跡，是藉由阻抗與暴力，刻寫下的痕跡。若不如此，經驗就無法被記載，無法被描述，甚至無法被意識。¹¹ 延異 (defer, différanc) 就是為了要延緩一個危險投注而發生的第一次的壓抑以及轉移投注的痕跡。¹²

德希達的說法，已經解構了所有本質化的單一起源。根據德希達的說法，並沒有單一的起源，也沒有同一律的邏輯。起源便是延遲以及延異，是阻抗而引發的關路，而日後的記憶則是以此關路所造成的痕跡為基礎，而重重銘刻與覆蓋。生命亦是因此延異與重複痕跡而被辨識為本質；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

⁸ “We cannot base our hopes on anything but a détente, in which a wisdom coming from the outside might make itself heard.”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II, “Epilogue,” 191

⁹ 「關路」：Bahnung, pathbreaking, breaching, contact-barriers, facilitation

¹⁰ “the permeable neurons (ϕ), which offer no resistance and thus retain no trace of impression, would be the perceptual neurons; other neurons (ψ), which would oppose contact-barriers to the quantity of excitation, would thus retain the printed trace: they thus afford a possibility of representing memory. This is the first representation, the first staging of memory.”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00-1)

¹¹ “We ought thus to examine closely—which we cannot do here—all that Freud invites to think concerning writing as “breaching” in the psychical repetition of this previously neurological notion: opening up of its own space, effraction, breaking of a path against resistances, rupture and irruption becoming a route (rupta, via rupta), violent inscription of a form, tracing of a difference in a nature or a matter which are conceivable as such only in their opposition to writing.”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14)

¹² “the effort of life to protect itself by deferring a dangerous cathexis, that is, by constituting a reserve (Vorrat).” “pain leaves behind it particularly rich breaches. . . . pain, the threatening origin of the psyche, must be deferred, like death, for it can ruin psychical organization.” (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202)

固定的本質。¹³ 並沒有一個待發掘的無意識區域，最初就是透過壓抑(repress)而延異(defer)的文本，一層又一層地書寫而覆蓋的心靈文本。

德希達的詮釋模式將心靈作為存在的本質，而這個本質是不斷變化，不斷複寫，不斷發生延異與歧出痕跡的文本空間。德希達說，心靈已經是被符碼化的空間，而延異便是「空間化」(spacing)的過程，是各種岔出的銘刻痕跡。這些書寫痕跡，縱使是以語音符號出現，也都是圖像式的密碼，透過心靈機器而書寫。心靈就是原初發生的文本，就都已經是轉譯，都是原初的痕跡，以原初模式發生，只有表面，而沒有另一個待發掘、待翻譯的無意識，沒有內外之分。(211)

德希達說，書寫就是技術 (technē)，既開啟又遮蔽，是在兩個裝置之間的倒轉關係，是生命與死亡的關連，是在場與再現之間的屏障，出現與隱藏。書寫一則打開空間，留下痕跡，再則也遮蔽了自己。德希達的說法讓我們必須面對文本，面對文本作為銘刻痕跡所攜帶出的心靈動態空間，而不另外索求其寓意或是隱藏意義。詞語便是被投注的對象，參與了原初的過程，攜帶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複雜關係。要理解其中的複雜情感模式，就要從語言學之外的方法論來探索其替代形成的邏輯。

書目

Bataille, Georges. *The Accursed Share II*, [1953-54] Zone Books; Reprint edition 1993.

Bataille, Georges.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By Allan Stoekl. Trans. By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 & Donald M. Leslie, J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Bataille, Georges. "The critique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By Allan Stoekl. Trans. By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 & Donald M. Leslie, J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105-114

Bataille, Georges. "Base Materialism and Gnosticism."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By Allan Stoekl. Trans. By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 & Donald M. Leslie, J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45-52.

Bataille, Georges. "Labyrinth."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By Allan Stoekl. Trans. By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 & Donald M. Leslie, J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45-52.

Bataille, Georges. "College of Sociology."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By Allan Stoekl. Trans. By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 & Donald M. Leslie, J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45-52.

Bataille, Georges. "Sacrifices."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By Allan Stoekl. Trans. By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 & Donald M. Leslie, J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45-52.

¹³ "Life protects itself by repetition, trace, difference (deferral). . . . as difference is not an essence, as it is not anything, it is not life, if Being is determined as ousia, presence, essence/existence, substance, or subject. Life must be thought of as trace before Being may be determined as presence." (203)

Derrida, Jacques.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first published in *Tel Quel*, no. 26, summer 1966, collected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 trans. Alan Bas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96-231.